

故乡的大会堂

□ 时庆荣

泰州城出发,沿兴泰公路一路向北,约走20公里,便到了我的故乡陈堡。陈堡是一个镇,隶属于兴化,临运河穿镇而过,有居民4万多人。

我儿时的故乡,是一个大庄子,四面环水,五座桥与外界相通。庄子上有公社的职能部门,有供销社、有粮管所、有邮电局,还有学校。

大会堂在庄子的东南,与小小学一墙之隔。大会堂南北长五十米,东西宽三十米。墙高三米多,下半段是砖头,上半段是一米高的泥草土墙。屋内木头大梁,竹竿屋架,屋顶上是稻草。大会堂西墙有两个三米宽的门,南侧没有墙,有一排可拆卸的木板。

据我舅舅回忆,大会堂建于1957年秋天,是举全公社之力建成的,四十二个大队都贡献了材料。

大会堂能容纳一千多人。公社开大会、宣传队演出、雨天放电影,都在这里。大会堂就像城里的文化宫,热闹非凡,尤其春节期间,更是热闹。

正月初一午饭后,庄子上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便涌向大会堂。大会堂的周围,此起彼伏的叫卖声,不绝于耳。大会堂的门前摆满了小摊,有套圈圈的、卖花生的、卖紫萝卜的、卖甘蔗的、卖气球的,还有专门吹糖的。吹糖人边吹边用手捏,做出鸡、狗、猴等一个个形象逼真的动物,专赚小孩的钱。有时还会捏出一个哨子,“嘟嘟嘟”,吹出响声。

我的一个远房表哥,在大会堂门口摆放了一台半人高的赌糖机。赌糖机,椭圆形,大小跟家里洗澡的木桶差不多,上面用玻璃盖住,底部有许多洞,洞洞相连,像个迷魂阵。每个洞口附近钉上钉子,上方放着价值不同的奖品。赌糖机的右下侧有一个带弹性的推子,拉出再松开,推子前端的小钢球就弹了出去。球在赌糖机里乱跑,最后掉进洞里。两分钱赌一次,每次一个球。庄子上的人好赌,却从未赢到大奖,大奖是一包价值两毛钱的棍子糖。几乎所有的球都进了同一个洞,大家称它“老鼠洞”。“老鼠洞”没有奖品,表哥会给赌糖的人一粒指头大的芝麻糖,以示安慰。

下午一点钟,宣传队陆续进场,轮番上场表演节目。那个年代,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,一个腊月都在排练节目。节目是清一色的样板戏,我的舅舅曾扮演过《沙家浜》里的英雄郭建光。舅舅戴着红袖章,手持盒子枪,昂着头,一路小跑一路唱。那架势,真是威风,至今还留在我的脑子里。

上学前,我喜欢和邻居的孩子在舞台上翻跟头、扮演坏蛋打打杀杀,直到演出的锣鼓声响起,我们才快速从一米高的舞台上跳到台下。

热闹的日子,一直持续到学校开学。大会堂的门平时是敞开的。麻雀飞进飞出,里面的鸟窝是它们快乐的港湾。

小学二年级,我经常和同学一起,去大会堂掏鸟窝。一个同学蹲下,我踩在他的肩上,我们扶着墙慢慢地站直身子。有时掏到几个麻雀蛋,有时抓到几只不会飞的小麻雀。有一回,当我把手伸进鸟窝时,碰到了一堆凉飕飕的东西,没等我反应过来,那东西突然从鸟窝里窜了出来,我惊呼一声“蛇”,从同学肩上摔了下来。那蛇掉在地上,快速向远处游去,至少有一米长,我们几个人吓呆了。从那之后,我们再也不敢去大会堂掏鸟窝了。

关于大会堂,有两件事,我印象最深。

一次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,学校召开大会,都在大会堂。有一个星期六下午,全校大会之后,每个班到舞台上表演一个节目。班主任吴老师安排我和一位曾姓女生,合演了一个节目。节目的大意是这样的。我扮演一名解放军战士,头戴黄军帽,身穿黄军装,背着一个黄书包,雄赳赳气昂昂,边走边唱: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,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……”走着走着,发现地上有一支红色的铅笔。看看四周没人,我捡起笔,自言自语地说:“谁的铅笔掉了?一定很着急。”

我正四处张望。这时,曾姓女生背着书包,低着头走了过来。

“同学,你找什么?”
“我掉了一支红色的铅笔。”
我拿出铅笔,问她:“是这支吗?”
她看看我,点点头:“是的。”
“还给你!”
“谢谢你!”
“不用谢,这是我们解放军战士应该做的。”

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演出结束后,吴老师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,她走到我跟前,用手摸着我的头,不停地表扬我,说:“不错,不错,演得好!”

50年过去了,不知在泰州人民医院工作的曾同学,是否还记得那次演出?

1979年,我上初二,放寒假前一天,学校在大会堂召开大会。开天辟地第一次,学校对优秀学生进行了表彰,高中和初中各评出一名优秀学生,每人奖励人民币15元。当蒋校长读出名字时,我惊喜万分,我就是那名初中学生。蒋校长站在主席台上,伸长了脖子,右手挥舞着手里的钞票,吼着嗓子对台下说:“同学们,15元啊,新崭崭的钞票。”

回到家里,我把钱从内衣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母亲。母亲愣住了,她双手握住钱,吃惊地望着我。当我讲完原委后,母亲激动地流下了眼泪,说道:“我的儿子有用了。”然后,擦去脸上的泪水,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那年春节,母亲花了七元钱,买了一条带花的棉被。这条棉被成了家里最值钱的当,后来我把它带到武汉,又带到南京。年数久了,棉被的面子缝补了好几处,但我一直没舍得扔掉,至今还垫在我的床上。

后来,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,陈堡也开始了新城镇建设,庄子的东面崛起了一座新城,休闲娱乐广场,数字影剧院、饭店茶楼、宾馆浴池,一应俱全。人们过上了美好富裕的生活。

故乡的庄子还在,只是破了旧了。小学搬迁了,大会堂也拆了,那里建了一座寺庙,一排门面房。

如今,每当回到故乡,我总要去老庄子走一走,看一看。大会堂没了,但儿时的记忆还在,那是铭刻在我心底深处的乡情。

“荷”来,何不来

□ 夏兴政

花,笨手笨脚地扒开荷叶荷花搜寻莲蓬,又抢过竹竿,“还是我来割吧,你把挪到岸边的莲蓬捡上来。”她挥舞着竹竿,继续毫不怜惜地割掉那些碍事的荷叶、荷花,让隐匿其间的莲蓬彻底暴露出来。尽管这样,由于莲蓬距离远,一下、两下、三下,几番使力才能割断。

割断的莲蓬连着长长的茎秆,母亲小心翼翼地用镰刀勾住莲蓬与茎秆的连接处,缓缓挪到岸边。而我拿着另一把镰刀,下到岸边,慢慢把莲蓬划拉过来,捡起扔进桶里。有时,稍不留神就割断了莲蓬头,一下落进水里,就比较费时费力了。母亲举着竹竿,镰刀刀尖对准莲蓬,猛地一砍,刀尖插入莲蓬,然后如钓鱼一般轻轻提起竹竿,莲蓬便顺利被“钓”上岸来。

这种独钓莲蓬的成功概率很低,因为莲蓬漂浮在水里,且视线受荷叶荷花阻碍,如果瞄得不准,砍力不能聚焦,刀尖一沾莲蓬,莲蓬便从水面弹开,常常失败多次才能成功。有时,实在砍不进去,只能用竹竿慢慢地拨,避开一株株茎秆,辗转腾挪到岸边,再捡拾起来。

夕阳湮没在村西头那棵大槐树苍翠繁茂的枝叶间的时候,母亲挥洒一身的汗水,终于割满一桶莲蓬。她放下竹竿,挺了挺已经直不起的腰身,双拳握成筒状,轻轻捶打着腰背,满意地扫了一眼桶里果实饱满的莲蓬,取下肩上搭着的毛巾,擦了擦满脸的汗水。“天色不早,也够吃了,回家!”母亲欣慰地对我说,满脸的皱纹洋溢着收获的喜悦,像一朵饱含阳光盛放的荷花。

回到家里,忽然发现墙角摆放着几盆绿植,零散地绽放着鲜艳的花朵。“栽花顺带的”,母亲瞧出我的疑惑,“都是栽剩下的”,扔了可惜,我觉得好看呢,就带回来了。”如今,村里只剩下留守老人、孩童,那些揽到园林、道路绿化活的包工头,只能领着一群大爷大妈干活。母亲也在其中,习惯把绿化称作“栽花”。我顿时觉得有些误会了她,谁说母亲不爱美呢?

每个人心中都藏着诗与远方。在垂垂暮年、于这片狭窄山水田园盛放了大半生命的母亲眼里,人生不过四季三餐:为风雪夜归的儿女留一盏洒满窗台的明灯、盛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;给我般匆匆游子一桶莲实、几把蔬菜、几句唠叨……遥不可及的诗与远方,并不比寻常烟火更美、更有滋味,母亲心中的美如此简单、如此甜蜜,顽强得成为一种乡土文化自觉。它,是屋顶上一缕缕轻柔缥缈的炊烟,是瓦缸里一粒粒晶莹剔透的大米,是灶台上一瓶瓶列装整齐的酱醋,是衣柜里一叠叠饱浸阳光的衣被,是归家时一句句温暖寒冬的叮咛。这种美,像一把岁月的刻刀,一刀一刀刻进我们的味蕾和心扉,深深地融入我们的灵魂,构成我们生命中鲜活的洗刷不掉的标签和底色。

返回城里,仔仔细细剥出一粒粒洁白如玉的莲子。望着一堆莲蓬、一摊莲壳、一碗莲子,恍惚间那茫茫的荷叶、袅娜的荷花、殷实的莲蓬,母亲那挥动着竹竿的纤弱身影,在眼前灵动起来。什么时候,我才能了无牵挂,回归故土,陪着双亲,做个闲人,对一张琴、一页书、一杯茶、一荷花、一溪云呢。



夕照
刘玉宝 摄

小小发屋

□ 余峰

镇江中营街的深处有一间小小发屋,名叫“琴缘发屋”,发屋的主人姓蒋,人们都习惯称他蒋师傅。蒋师傅60多岁,中等身材,微胖,为人和善。发屋不大,十多平方米,没什么装潢,甚至有些简陋。一把老旧理发椅,一面镜子,一个工作台,一套理发工具,一台小电视机就是发屋的主要家当。

小发屋,小生意,蒋师傅经营这间发屋已有十多年,中营街周围的人家,大人小孩都与蒋师傅熟悉,他们既是顾客又是邻里,既做生意又拉家常,街上有些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,蒋师傅还主动上门为他们理发。蒋师傅手艺好,对人热情,价格公道,发屋生意很好。有些原来住在中营街附近后

来搬到其他地方居住的顾客,还会赶到蒋师傅这里理发,他们一是来理发,也是来看看蒋师傅,和他聊聊天。

蒋师傅从事理发这个行当已有半个世纪;上世纪70年代初,蒋师傅就在镇江大市口著名的京江理发店理发,因为手艺好,工作认真,蒋师傅还被选派到驻外大使馆从事理发工作几年。十几年前因企业改制,蒋师傅提前退休,在中营街租下了一间小屋,重操旧业,干起了老本行。

蒋师傅是个懂生活,会生活的人,他的作息很有规律,每天早晨八点半准时到发屋,开始一天的工作,一年四季,无论春夏秋冬,晚上中营街路灯亮起,就是

蒋师傅下班的信号。每周二下午蒋师傅固定休息半天,自己给自己放假,到浴室泡泡澡或者到老年大学唱唱歌,放松一下自己。老顾客也都知道这一时间他不在。平时不忙的时候,蒋师傅会打开电视机,看看电视或者听听音乐,打发时间,适当休息。蒋师傅说他开发屋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生活和赚钱,而是使自己的退休生活更加充实,更好地发挥余热。

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蒋师傅每天坚守着发屋,吃着粗茶淡饭,做着自己想做的和熟悉的事情,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着平凡知足的小日子,在为大家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愉悦了自己,这未尝不是一种简单的幸福。

秋初访茅山

□ 侯利旺

我是在秋初的一个下午,登上茅山的。那天秋高气爽,游客也少,我乘坐景区的大巴,缓缓向上,茅山古名“句曲山”,一边在镇江句容境内,另一边则是常州金坛,我所处的是句容茅山。

茅山是一组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峰的总称,“状如左书已字之形”。金陵人陶弘景说:“今以在南最高者为大茅山。中央有三峰,连岑鼎立,以近后最高者为中茅山。近北一岑孤峰,上有聚石者为小茅山。”我透过车窗,可见山路曲回,泉石峥嵘。下了车还要走一段路,白居易云:“秋景引闲步,山游不寂寥”,我一鼓作气登上了顶宫,顶宫坐落在主峰大茅峰巅,目不暇接的是遍野的绿,山中道观正散落在满山绿意之中。我继续登上峰巅,远眺山林连绵,云水苍茫,烟雾缥缈。正如陶弘景所记:“青林翠竹,四时俱备。实是欲界之仙都。”难怪,吴王夫差在茅山修建候君台,让美人西施在茅山流连两个夏天。

茅山固然美,然而以中国幅员之辽阔,山水之众多,相比于名山大川的“千峰排

戟,万仞开屏”,或“重重谷壑芝兰绕,处处崖悬苔藓生”。茅山既非高耸险峻,也无委婉动人,海拔仅有三百七十二米,绵延三十公里,乍看也不算特别。

人有云:“起伏峦头龙脉好,必有高人隐姓名。”因炼丹术而知名的葛洪就出生在茅山脚下,他流传千年的大作《抱朴子》,是其隐居茅山时而编著。葛洪在六朝时期地位独特,南京建有六朝纪念馆,我去参观,处处可见有关葛洪的记载,但可惜的是,翻看《抱朴子》,历数当时可以修道合仙药的江南名山,句容茅山并不在其列。

“秦汉神仙府,南梁宰相家”,让茅山声名超过山的本体,而后漫山云雾间又遍布仙踪道影,这离不开金陵人陶弘景,陶弘景是齐、梁间著名道士,曾任齐诸王侍读,后拜左卫殿中将军。永明十年,他隐居句茅山,开创道教茅山宗。据说,齐梁两朝帝王多次征他出山,均不应召。某次,齐高帝诏问陶弘景曰:“山中何所有?”陶答:“山中何所有?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寄

君”。隋唐时,茅山成为天下道教的核心,是道教的第一圣地。句曲山洞天位列道教十大洞天之一。

云雾之山,虽自古出珍奇,也更接地气。等我下了山,已落日黄昏,山脚下数不清的饭馆,我择了一处进去,慕名点了当地特色老鹅。鹅,自古以来就是代代相传的美食。我心中最地道的做鹅菜谱,为明代苏州人韩奕记载的:“鹅一只,不碎,先以盐腌过,置汤镬内煮熟,以鸭弹三五枚酒在内,候熟,杏臛浇供,名杏花鹅”。茅山自古以来就以养鹅腌制而闻名,茅山老鹅选取本地的土鹅,过去是村民腌制过年的自备菜品。等端上桌,我尝一口下肚,肉质鲜嫩,肥而不腻,恰好入味,嘴中留有久久弥香。

我吃着老鹅,静静坐在窗边,想着此程只是踏足茅山一脚,茅山还有无边的静绿,比如茅山的九峰、十九泉、二十六洞、二十八池,走走不完。茅山还是诗化的山水,名人雅士吟诵茅山的诗词歌赋,千年也诉说不尽。

我心中的那拉提

□ 张玉坤

我到过许多草原,为什么你让我一生向往?不是因为起伏连绵,不是因为水草丰美,是因为这里总是“有太阳”。

我去过许多草场,为什么这里总让我难忘?不是因为牛羊成群,不是因为你牧民聚集,是因为这里哈萨克人心灵自由热情奔放。

我见过无数草原骏马奔驰,为什么你让我总想歌唱?是因为你河谷平原,山峰高峻,是因为你森林茂密,亚高山草甸,不由得让人开怀畅饮信马由缰。

我听过无数草原美丽传说,为什么你让我总是心有光芒?是因为你杏花酿的美酒,是因为在这里总能听到可托海牧羊人的歌声,他的心上人来到了这最美的地方。

新书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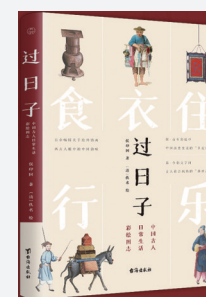
《风骨: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》舒晋瑜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定价:59.00元

写了周有光、钱谷融、许渊冲、吴小如、宗璞、徐怀中、邵燕祥、张承志、韩少功等29位学人,不同的时代尽显不同的人生历程。



《敦煌人生:我的父亲段文杰》段善善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定价:88.00元

原敦煌研究院院长、敦煌学专家,被誉为“大漠隐士”,敦煌第二代守护人的人生经历。



《过日子:中国古人日常生活彩绘图志》侯印国 著 台海出版社 定价:69.80元

衣食住行乐,159幅精美手绘外销画,直观展示古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;告诉你300年前中国古人的日子究竟怎么过。



《一认真你就赢了》李若辰 著 接力出版社 定价:45.00元

一本教你“学好也要玩好”的书,学习、生活、人际、未来四大板块,44条给中学生的贴心建议,陪你度过人生关键期。

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